

隱秘的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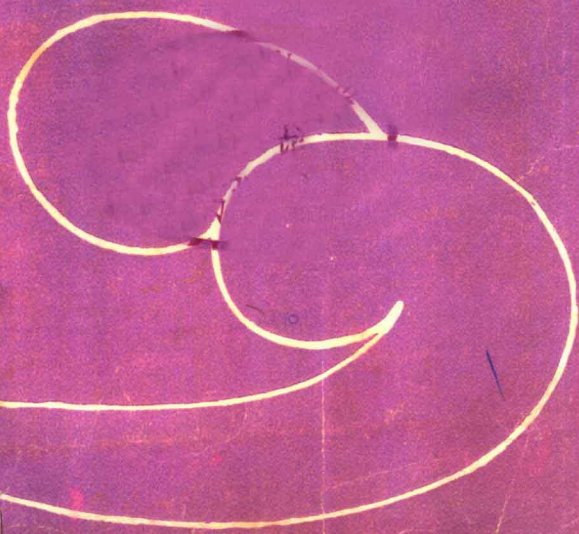
47.225
2-C14

877591

隐秘的恋情

(奥地利)J·M·西默尔 著

周新文 译 佚文 校



(京)新登字093号

J. Mario Simmel

Affäre Nina B.

根据德国Rowohlt出版社1972年版本译出

隐秘的恋情

〔奥地利〕 J. M. 西默尔 著 周新文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64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26-6/I·217 定价：4.00元

印数：00001—12000册

序

他有许多敌人，我是他的头号敌人。许多人恨他，我比所有人都恨他。不少人咒他死，我则决心促成他的死亡。

这一天到了，我等够了。现在等待终于结束了。我犹豫了很长时间，现在犹豫也过去了。此时此刻，是决定我和他的命运的时候了。

4月7日这天，巴登—巴登天气晴好。温和的太阳照耀着坐落在谷底的城市。城里到处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我开车行驶在利希滕塔勒林荫道上。奥斯河岸长满了报春花、樱草、番红花和紫罗兰，河水静静地向前流淌着。我开的是他三辆车中的那辆重型凯迪拉克，车身是红黑两色，配着白色的轮胎。

街上，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友好和喜悦。女士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薄薄的连衣裙，神秘地微笑着。很多人戴着漂亮的帽子。这天早上，在我去警察局的路上，见到不少这种很美的帽子，好象是帽子的春天。

男士们身着各色西装，不慌不忙地注视着街上的女士们。他们有的是时间。在这春天的早上，除了我，巴登—巴

登城里没有人匆忙行事。仇恨驱赶着我，我自己制造的，看不见也听不见的“钟”在催促我。在他的死亡到来之前，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安宁。

车转弯时，后视镜里映出我苍白的脸，看上去病容满面：眼圈发黑，嘴唇发白，额头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我摘下鸭舌帽，擦去脸上的汗水。鸭舌帽与双排扣华达呢西服都是灰色的，府绸衬衣也是灰色的；领带是深蓝色，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浅口皮鞋。作为尤利乌斯·布鲁默的私人司机，我就得穿戴这样的衣服。

他的全名叫尤利乌斯·玛丽亚·布鲁默，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告诉我，他母亲非常想生个女孩，给她取名叫玛丽亚。他出生之后，母亲大失所望，很不高兴，于是只得把女儿的名字冠在他的名字前面……

车驶到大西洋饭店。平台上很多客人坐在红白条纹的大遮阳伞下用早餐。平台下的树篱刚刚浇过，饭店对面赌场的大玻璃窗照得人眼花缭乱。我猛踩一脚油门，时间不等人，我必须赶紧去举报……

州警察局坐落在苏芬街。守门的警察面带微笑，向我举手敬礼，眼睛注视着我不上衣左边翻领上的两个字母。是的，大多数人看我时，总是注意这两个用金子铸成用金别针别在衣服翻领上的字母：JB——这是他名字的字首。

“您有什么事？”警察问。

“我来举报。”

“进门左拐，3楼31号房间。”

“谢谢！”

3楼31号房门上写着：

受理检举揭发

站在门前，我想着尤利乌斯·布鲁默年轻漂亮的妻子尼娜，我是那样地爱她。同时，我又想着尤利乌斯·布鲁默，我是多么地恨他。

尼娜在我的脑海中一闪即逝，而布鲁默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恨远远胜过对尼娜的爱。我不能象恨尤利乌斯·布鲁默那样强烈地去爱。

站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我用手摸着胸前的两个冷冰冰的金质字母，鼓了鼓勇气，去敲那扇木门。

“进来！”从房间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房间里陈设着现代化的家具：几把舒适的软椅、浅色公文柜、宽大的松木写字台。写字台放在敞开的窗前。阳光照进房间，照在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的宽宽的肩膀上。我进屋时，他正在打字。他停下来，望着我。

“您有什么事？”

我摘下鸭舌帽，朝他一鞠躬：“我是来举报的。”

这位30岁左右，给人好感的人朝近处的沙发做了个请坐的手势。我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把一只手放在桌面上，我想给人轻松自如的印象。

这位警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剪得短短的，看上去象把刷子似的。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唇则令人吃惊地鲜红。他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和米色的运动衣。绿色的领带与上衣式样很不相称。

警官的眼光例行公事地在我脸上巡视一番，注视着18K金的JB字母章说：“我是当班的警长，我叫凯尔曼。”

“我叫霍尔登，罗伯特·霍尔登，”我平静地说。

“您住在巴登—巴登吗，霍尔登先生？”

“不，我住在杜塞尔多夫。我只是在这里暂时逗留，送上司到这儿来疗养的。我是司机，我的上司叫尤利乌斯·布鲁默。”

“噢。”凯尔曼这种沉着的反应说明他肯定知道尤利乌斯·布鲁默。大多数德国人都知道他。最近半年来，他的名字以及他那张宽扁得象面团似的脸，一双水漉漉的圆眼睛和那浅黄色的小胡子，在报刊上及电视银屏上时时可见。自从他的被捕震动了杜塞尔多夫商界及社交界，以及随后的轰动一时的释放又导致了联邦议会里社会民主党派的质问之后，在报刊上就不断出现有关他的文字及图片报道。是的，尤利乌斯·布鲁默成了一位大名人！

我对凯尔曼说：“也许您会吃惊的，我的上司现在在巴登—巴登，几个月前，拘留待审就中止了。”

“噢。”他又平静地说，然后不带任何感情地问，“您想检举布鲁默先生吗？”

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近来不断有人检举布鲁默先生。凯尔曼给人的印象是，他好象愿意办理这类事情。

“不，不是检举布鲁默。”

“那么，是什么事，霍尔登先生？”

我曾仔细地考虑过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曾无数次地、仔细地背读过答词。我要说的话使我感到特别陌生，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我看着警官的蓝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举报一件盗窃、诽谤、破坏家庭和诈骗银行案。”

凯尔曼平静地问：“举报一个人吗？”

“是的，”我也平静地回答道，“是一个人。”

“好极了，一个人。”

“我还没说完呐，”我严肃地接着说，“这个人最近又要涉嫌谋杀罪了。”

他沉默不语，长时间地看着我。我知道，不管谁受理我的检举，听到这种话后，都会许久地注视我的。我毫无表情地迎着警长凯尔曼的目光。

“您要检举一个不知名的罪犯吗，霍尔登先生？”

“不。”

“您知道此人的名字吗？”

“是的。”

“他叫什么，霍尔登先生？”

我多么强烈地恨尤利乌斯·布鲁默。在我一生中，我甚至不可能这么强烈地去爱一个人。我下定决心，促成他的死亡。我大声地回答：“这个人叫罗伯特·霍尔登。”

警长又一次将目光对准了我衣服上的字母章。

我给他时间。我知道，对于我说的话他需要时间思考。沉默片刻后，他就发话了：“您叫罗伯特·霍尔登，您想检举罗伯特·霍尔登。”

“是的，警长先生。”

下面街道上驶过一辆大卡车。我听到换档时的咔咔声。

“还有谁叫罗伯特·霍尔登吗？”凯尔曼又问道。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早就仔细考虑过了。我说：“没有第二个人叫罗伯特·霍尔登。”

“这就是说，您要告发您自己？”

“对的，警长先生，”我客气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章

1

我与警长凯尔曼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极认真地听我叙述，然后让我回饭店听候通知。我如果要离开此地，必须事先告诉他，不准擅自离开，他还告诉我，调查工作立即开始，我会知道进展情况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有理由逮捕我。实际上，我所叙述的故事可没那么简单。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复杂的故事（下面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他不敢立即抓我进监狱，他放我走了……

现在我心惊胆颤地坐在旅馆房间里，手脚冰凉，头疼得要爆炸。脑子里总是萦绕着一件事：凯尔曼相信我讲的故事吗？

要是他不相信我讲的故事，我就完了，所有那些巧妙的安排，细致的准备，都成为泡影，一切都完了。

要使自己镇静下来，不要有轻率的举动。要清醒地思考问题，整理思绪，只有写回忆录才能有所帮助，才有希望战

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面前桌子上摆着500张白色的打字纸，这是我离开警察局后，下决心从今天开始记日记时买的。我已经写了十几张了，我记下了我对尤利乌斯·玛丽亚·布鲁默的仇恨，同时也描写了到警察局去的过程以及和警长的第一次谈话。我决心要检举揭发我自己。

写到这里我搁笔了。

我给凯尔曼叙述的事情，正是我这半年来所遭遇的离奇的经历。

我要从头讲起，就必须追叙到去年8月那个下雨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尤利乌斯·布鲁默。从那次见面写起，按时间顺序写到今天，写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写的这些材料日后会有两种命运：也许会成功。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又少了一个无赖，我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平安地生活。这些东西我愿自己保留着，时常地读读它，从而确信，在这个到处是丧失了勇气的法官及受贿赂的证人的世界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触犯的正义。

另外一种命运就是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警长凯尔曼可能把我写的材料当作我的供词。

2

我第一次遇见尤利乌斯·玛丽亚·布鲁默，是在1936年8月21日晚。杜塞尔多夫正下着雨。我坐着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从市中心赶往切西利林荫道。此刻正是工人和小职员们下班回家，车里弥漫着潮湿味，廉价的鞋油味，变质了的油

脂味以及污浊的气味。车顶暗淡的灯光照在人们疲劳的脸上。我身旁的一个年轻女郎描着口红。汽车摇晃着行驶在雨雾中。姑娘涂好了口红，又耐心地擦去重涂，然后举起粉盒，对着小镜子练习各种微笑。

售票员心绪不宁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玻璃窗上淌着雨水，街上灯光闪烁。人们逐渐下车了，他们艰难地在劲风中撑着雨伞行走，很快就被黑暗吞没。

“宫廷花园站！”闷闷不乐的售票员喊道。我下了车，雨水拍打着脸，我竖起旧雨衣的领子，沿着切西利林荫道朝前走去。在一棵树下我站住了，卷起了裤腿。这是我唯一的一套蓝西服，我不能把裤腿弄脏了。我身上只有1马克30芬尼了，几个月来我一直拖欠着房租，房东太太已经不和我说话了。

狂风呼啸，水面传来轮船汽笛声。我突然瞧见许多人站在敞开的花园门前。这儿被车灯照得很亮。走近时看见后门的花园里等着三辆汽车，警察正跑前跑后地忙碌着。

“切西利大道486号”一块小瓷牌挂在栅栏上。我挤进人群。这里男男女女至少有三十多人，瞧着那些急急忙忙穿过湿漉漉的草地走向汽车，或老树后面那幢别墅里去的警察们。这里好象是为拍电影而布置的场景，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大门旁有两个老妇人。

“用煤气，”一个说。

“胡说，”另一个说，“是氢氟酸和来苏。”

“是煤气，”老妇人坚持说，“我听救护车上的小伙子说的，她已经死了。”

“她要是死了，为什么又响警笛又闪灯急着把她运走？”

“你要是也有这么多钱……”第一个老妇人又说。

“就是氢氟酸！”第二个老妇人打断了对方的话，咳嗽了起来，喉咙被痰堵住了。

“这里出什么事了？”我不由自主地插嘴道。

两个老妇人盯着我，灯光照亮了两张好奇的脸。

“被上帝召去了。”第二个老妇人说着打了个喷嚏。
“我们大家都要被上帝召去的。”

我走进大门，一辆巡逻车横在通往别墅的砾石子路上。一个年轻的警察正对着手里的话筒喊：“喂，喂，中心……这里是杜塞3号……”

在一阵咔咔声中传来说话声：“杜塞3号请讲……”

“救护车驶往玛丽医院，杜塞4号把男主人从办公室带来了。”雨水灌进年轻警察的衣领里。

没有人注意我，我继续朝前走。从杜鹃花丛中摇摇晃晃地窜出一条瘸腿的黄狗，身上的毛全湿了，短尾巴不停地摇着。这条可怜的看家狗钻进我的两腿间，叫了起来；我弯腰抚摸它，它耷拉着耳朵。这时我才发现，这条狗的眼睛已经半瞎了。这时，狗突然倒在地上，然后又爬起来，缓慢地爬进灌木丛中。

一个人冲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嚷道：“您是《夜间快讯》的摄影师吗？”

“不是。”

“上帝啊，简直糟透了。那小子跑哪儿去了？”

他又冲进黑暗中。

别墅里所有的窗子都亮着灯，大门敞开着。大门上镶有手掌大小的两个金字：“JB”。

我走上三级石阶来到大厅里，这里有许多扇门，一个壁炉，一道宽大的黑木楼梯通向楼上。壁炉台上放着古老的铜器，那只半瞎的狗摇摇晃晃地撞进来，爬到壁炉前，伸开四肢躺下。

大厅里人真不少。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三个穿皮上衣的警察和四个穿便装、头戴帽子的人站在角落里对着笔记。所有通向各房间的门都开着。

壁炉前还坐着一位穿便装的男子，正对着放在膝盖上的电话大声嚷嚷：“什么？头版上没位置了？把第二栏里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消息撤下来！我从这里报道的才是最好的新闻，整座房子至今还散发着煤气味！”

确实，我一踏进大厅就闻到一股混浊的气味。

“要咖啡吗？”身后响起一个无精打采的声音。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白头发的小老太太，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老太太身穿黑色的衣裙，外罩白围裙，温顺的眼睛红肿着。“您喝咖啡吗，先生？”语调中带有僵硬的捷克口音。

“不，谢谢。”

她端着盘子走到刑警和记者面前。“先生们，想要咖啡吗？”老太太用一种悲戚的音调说。她完全沉浸在悲哀中。

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转过身，一个警察不信任地打量着我：“您是谁？”

“我叫霍尔登，”我非常客气地说。我可不愿意惹麻烦，尤其是和警察打交道……

“您是这里的？”他一副疲劳相，左眼睫毛神经质地颤动，身上的皮外衣湿透了。

“不是。”

“那您是怎么进来的？”

“从大门进来的。”

“别这么嬉皮笑脸。”

“我没有瞎说。”我低声下气地说，“我真的是从大门进来的，我来这儿面试。”

“干什么工作？”

“当司机。”我试图露出微笑，可惜没有成功。我不由担起心来。尤利乌斯·布鲁默的秘书通知我，我应当面见他本人。当时我很有信心，生活从此会给我提供机会。就是在5分钟前，我穿过雨雾到这儿来时，也充满了希望。而现在我感到恐惧。

“有身份证吗？”警察又问道；他瞧着我高高卷起的裤腿，脚上穿的旧袜子和一双滴着雨水的旧皮鞋。

我递给他证件。

“德国公民吗？”

“当然，不然我不会有德国证件。”

“别用这种腔调，霍尔登先生。”

“我又没干什么，您怎么象对待罪犯一样和我说话。”

“您住在杜塞尔多夫？”他接着问。

“格罗佩罗街180号。”

“这上面写着居住地——慕尼黑。”

“我以前住在慕尼黑。”

“什么时候？”

我的双手开始颤抖。“我一年前搬来的，”我不自然地说。

“结婚了？”

“没有。”

“您认识布鲁默先生？”

“不认识。”

“布鲁默太太？”

“也不认识。到底出了什么事？”

“布鲁默太太——”他说，左手大拇指朝着地上一指

“死了？”我问道。

“还没咽气。”

“自杀？”

“瞧着象。”他把证件还给我，疲惫地笑了。“从这儿过去进第二道门，让厨娘给您杯咖啡。布鲁默先生要等会儿才来。”

3

她叫弥拉·布雷霞娃，布拉格人。

她长着宽扁鼻子，有口漂亮的假牙，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模样最善良的女人，你只要看她一眼就知道，这女人从来就没撒过一句谎。这女人不可能做出卑鄙的事来，她正站在厨房敞开的窗前做晚饭。

“真是不幸，太不幸了，先生……”泪珠滚落在她皱巴巴的脸颊上。她用右手臂擦去眼泪。“真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您不知道，尼娜，她就象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孩子。”

我坐在她身旁喝咖啡，抽着烟，尽管窗子大开着，还是能闻到厨房里的煤气味。

“您早就认识布鲁默太太？”

“先生，三十多年了。”她往肉片上抹着芥菜。一双皮肤粗糙的手熟练地操作着。衣服左肩上别着两个金字：JB。

“我是尼娜的保姆。我教会她走路、用刀叉吃饭、梳头、祷告。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主人出去旅行总是带着我。总是和我的尼娜在一起，噢，老天，她得麻疹和百日咳那阵子……后来，父母亲去世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去世了。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可怜的小尼娜……”

厨房外面不断地传来记者和警察含糊不清的说话声。

“她是多么漂亮呀，先生。就象活的天使。她心地善良。要是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在一起经历过多少事啊！维也纳的灾难，战争，轰炸，还有后来的幸福和欢乐。”

“什么样的幸福和欢乐？”

“就是这位尊敬的先生，他爱上了尼娜。婚礼、貂皮大衣、钻石手饰、高雅的房子……”她的脸突然痛苦地抽搐着。“我又打嗝了，只要我一激动就这样。”她把洋葱片放在猪油上。

脚下响起一声低沉的汪汪声，那条老看家狗在炉旁蹲缩着，半瞎的眼睛望着我们。

“我可怜的波普勒。太可怕了……”

她对狗点点头，它跑过来在她腿上蹭着。弥拉·布雷霍娃卷起一个肉卷。“要不是波普勒，她肯定早就死了，我的尼娜……”

“出了什么事？”

“今天是星期三，仆人、女佣和我下午都外出。下午2

点半时，尼娜让我去看电影。但我不想去，我想和波普勒去散步。我们走到打猎俱乐部，波普勒突然狂叫起来，挣脱绳子往家跑。这条狗感觉到了……我感到害怕，和狗一起向家里飞跑。一走进厨房，见尼娜躺在炉前，所有的煤气灶都开着。”她又开始打嗝。

“你们离开了多久？”

“3个小时吧。”

“3个小时足以使……”

“她还吃了佛罗娜，先生，整整一小瓶，12片。”

“布鲁默太太多大年纪了？”

“34岁。”她把第二个肉卷卷好，又扔给狗一块肥肉。

“她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婚姻幸福吗？”

“世界上最美满的婚姻。主人把尼娜捧在手上还怕摔着。钱也多，无忧无虑。我不明白……”

4

挂在门旁的电话响了，老太太取下耳机。“喂，请讲，”弥拉对着话筒说。

“好的，先生。我现在就上菜。”

弥拉早已知道我的来意，对我和善地点着头说：“司机在这儿呢，说是您让他来的，先生。他等了很长时间了。好的，我告诉他。”她把话筒挂上，走到餐具桌前，开始在摆